

# 書評論文：中共政治改革文本 的蟄伏與開展

何清漣，現代化的陷阱  
吳敬璉等，漸進與激進  
徐勇，包產到戶沉浮錄  
顧龍生，毛澤東經濟思想引論

石之瑜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

## 摘 要

中國大陸的政治改革不是短期現象，不是線性發展，更不能切斷時間點來觀察。發覺潛在改革方向的可能性範圍，比決定某個特定方向的改革會不會發生，可能更有意義。所以未來中共政治改革途徑的可能性，就應該用最開放的視野來調查，而開放視野的建構，則必須仰賴對文本不斷地解讀。本文將用一個層層回溯的方式，借用四個文本，來探索當前改革的意義。第一個是何清漣的現代化的陷阱，從她對改革的批判中，開拓更多改革的可能模式。第二個是吳敬璉的漸進與激進，並試圖從中賦予漸進概念更多元的意義。第三個是徐勇的包產到戶沉浮錄，藉以說明今天的可能性是如何在過去被保留的。第四個是顧龍生的毛澤東經濟思想引論，在所謂作者已死的情境中，藉由前三個文本來重新實踐毛關於「調查」的方法論。這四個文本的選擇有偶然性，也有時空性，重點不在他們是否具備可比較的共通架構，而在於他們所能透露出的論述可能性。研究政治改革文本的目的，不是要指導改革的方向，而是要說明逆向能動性的無所不在與無可壟斷，將對政治改革的探討，超越制度規範與社會勢力的層次，回歸到最原初的混沌中，從而開放更多的可能性。

關鍵詞：現代化、改革、政治改革、論述分析、文本分析

\* \* \*



## 一、中共政治改革研究的意義

在一般研究中共政治的英語文獻中，有意無意間都強調中共政治與自由主義政治不同之處。但自二十世紀八零年代以來，大陸推行的經濟改革，給自居於外在世界的觀察家一個新希望，那就是中共政權會否因為經濟上與世界更融合，而孕育出大陸上的市民社會，從而改造中共政治的本質，使之向自由民主方向邁進<sup>①</sup>。在這其間，大陸雖曾經歷了天安門事件，但其後的發展卻似乎說明去社會主義的潮流不可逆轉，隨著大陸加入世界貿易金融體系，因應而來的，恐怕必然是資本主義世界所熟悉的某種政治改革。

衆所週知的是，中共自己也談政治改革，但主要是以行政革新為其內容<sup>②</sup>。這個內容固然有其意義，也應當嚴肅以對，但是在政治學界的既有論述上，行政革新並不能引起大量探討，以致於中共關於政治改革的定位，無法成為研究議程上激動人心的話題。然而，行政革新與民主化並不一定是兩個不相關的議題，它們都是針對過去的修正主張（若因人而異，或可稱為革命主張），而且互不否定。不過，行政革新作為政治改革的內涵的話，的確對於自由主義線性史觀下的政治改革研究，有一種諷刺的作用。

行政革新是要強化共產黨領導用的，而民主化的提倡者則是希望弱化黨的領導，起碼，在共產黨的理解中，民主不能是用來推翻共產黨的，就像自由主義者雖不反對行政革新，但絕不能接受那是共產黨鞏固政權的一種調整策略。可見，雖然行政革新與民主化可以同步進行，但它們各自背後的意識形態卻南轅北轍。如此一來，對某些人的改革，在其他人的心中體會起來，反而可能充滿了反改革的意義。本文的目的，則是發掘這些不同的改革邏輯之間，其實有論述上已經存在的互通機制。

不論在倫理上或實證上，所謂改革，都不應該理解成是封鎖其他所有的可能性，好來向某個單一目標模式前進。這樣的改革不但具有對抗性，也具有壓迫性。改革首要必須做的，應是認可並發掘更多發展模式與組織途徑的可能性，並且在調整與變革的過程中，設法容許這些其他可能性被保留。所以，研究政治改革時，應當由當地政治改革的需要與實踐著手，才能容許研究者看到其中的偶然性、紛雜性、非線性，而不是選定一個先驗的目標模式作為分析依據。先驗的目標具有論述上的封鎖作用，使研究者看不到可能性。

註① 來自西方的外在觀察範例可參見 Gordon White, *Riding the Tig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Kevin J. O'Brien, "Implementing 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s Villages,"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32 (July 1994); Arthur Lewis Rosenbaum, ed., *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 The Consequences of Reform* (Boulder: Westview, 1992); 採取中國的觀察角度提出反省，但仍在同一種市民社會論述中思考的範例，見鄧正來，*研究與反思*（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

註② 參見李永春，羅健（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政治體制改革的理論與實踐*（北京：春秋出版社，一九八七年）；鄧小平，*鄧小平論黨的建設*（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〇年）。

## 二、改革政治內涵的變遷紛雜

一般討論到中國大陸的政治改革時，通常採取兩種視野，其一是自由主義（主要是英語文獻與海內外同情民主運動的勢力）所最關心的民主化問題，其二是大陸官方所最重視的行政改革問題。如果將觀察位置拉的長遠一點，會發現其實今天人們所關心的政治改革，有一個歷史的過程。換言之，今天談的政治改革，不論指涉的是民主化或行政革新，並非針對中共過去五十餘年的統治風格的整體改革，而是在過去五十年所提出的各種政治改革脈絡中，另一波最接近當下時空點的改革。所以，研究政治改革無異於研究改革政治，即改革本身就是一個一直存在的課題，並不是在二十世紀之末十年才發生的。改革者，政治的內容也；改革絕非是外於政治的治療方案。

近年來在中國大陸，政治改革的呼聲依舊不斷，但是政治改革的內涵卻不斷地發生變化，每每隨著當時的情境與需要，會出現對前一個時期發展的某種辯證反應，於是有了在政治或經濟領域裡進行調整的政策，爲了配合調整的推動，便產生了某種政治改革的論述。在這個廣義的理解之下，包括一九五八年的人民公社運動與一九六六年正式發動的文化大革命，都屬於政治改革的範疇。因此，即使是到了二十一世紀，談政治改革的人都不能忽略，改革的主張有這麼一個不可考的歷史源頭，就連鼓吹民主化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都逃脫不掉對過去歷史形成一連串反動的反應。

包括在大陸上的許多人都以爲，政治改革的需要是在經濟改革之後才獲得躍升的<sup>③</sup>，對八零年代以前的政治變遷而言，這一點顯然還不充分。在商品經濟降臨之前的改革意識，是來自於後文化大革命時期對文革的反省，故當時討論的乃是法制改革的問題，思考如何避免再有文革時期那種大民主的不當思惟，這同時就引發了關於黨政分開的問題。同一時期更重要的是公社開始解體，農村聯產承包制逐步取代了生產隊，成爲基礎農業部門主要的生產關係。爾後的政治改革必須在這樣的脈絡中理解。

一九八四年城市改革開始之後，商品經濟的建立過程進一步引發了關於鬆綁的問題，這時提出的政治改革或民主改革，是相應於經濟民主化所帶來的市場競爭而言的，重點在於國家與企業的管理要分開，故改革的重點是政企分開。但是國家計劃體制的鬆綁不可能一步到位，何況鬆綁的意義是什麼根本缺乏共同的體認，這時所出現的嚴重社會經濟危機，在通貨膨脹、官倒腐敗、重大刑案、收費攤派等等亂象中，併發出來。同時被揭露的是，黨政完全沒有分開，政企也沒有清楚分開。這時，因應這個危機社會所需要的政治改革應當有何內涵，益發的不明顯。

註③ 即使立場不同的學者，都是在這個前提下進行討論，參見周雪光（編），《當代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台北：桂冠出版社，民國八十一年）；劉軍寧，「轉型與立序」，中國事務季刊，第四期（二〇〇一年），頁四七～五七；徐湘林，「以政治穩定爲基礎的中國漸進政治改革」，戰略與管理，第五期（二〇〇〇年）。

比如，黨中央第三代集體領導的形成，他們循序接班，循序傳承，理當視為是一個重要的政治改革；保守與改革派在思想上的交鋒，必然是任何政治改革之前必須解決的根本問題；因應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產權變革，甚至可以用革命來形容；港澳回歸與一國兩制的開展，更替未來政治改革地方化的可能性，奠下論述上的正當性基礎。簡言之，衝擊到中共執政形態的任何制度變遷與權力分配，都不能排除在政治改革的概念之外。

所以，政治改革的進程要從部門化、議題化的趨勢中觀察。比如在農村，聯產承包制造成農村行政組織的鬆解，政策得不到推行，農村公用事業廢弛、公共基金流失，然而在基層自發而偶然的實驗中，後來則有中央加入提倡的情形下，村民自治成爲農村政治改革的主要項目。又比如在國有企業部門，國企改革在九零年代末期被提到議程的最優先位置，其成敗成爲國務院總理朱鎔基續任與否的條件。相對於此，政府部門在世紀末的改革重點則是裁汰冗員。另外，由中央發動的更大一波政治改革，乃是針對司級與省廳級以上高幹的防腐肅貪。

面對五花八門的改革，對政治改革的解讀也衆說紛紜。但是在其中，因爲村民自治從九零年代如火如荼的開展，掀起海內外自由主義陣營的殷切期盼，便希望農村選舉的普及，終能爲中國民主化催生的看法<sup>④</sup>，最不可取。因爲這種看法，將政治改革的意義看成是邁進一個特定模式的過程，犯了歷史上與倫理上的雙重錯誤。在歷史上，改革不會間歇，方向未曾固定，曾經帶來災難，也曾走出災難；在倫理上，改革不能用來封鎖社會發展的可能性，而應當用來開創可能性。

本文以下將用一個層層回溯的方式，借用四個文本，來探索當前改革的意義<sup>⑤</sup>。第一個是何清漣的**現代化的陷阱**，從她對改革的批判中，開拓更多改革的可能模式。第二個是吳敬璉的**漸進與激進**，並試圖從中賦予漸進概念更多元的意義。第三個是徐勇的**包產到戶沉浮錄**，藉以說明今天的可能性是如何在過去被保留的。第四個是顧龍生的**毛澤東經濟思想引論**，在所謂作者已死的情境中，藉由前三個文本來重新實踐毛關於「調查」的方法論。這四個文本的選擇有偶然性，也有時空性，重點不在他們是否具備可比較的共通架構，而在於他們所能透露出的論述可能性。

### 三、先驗市場之外的政治道德

何清漣所發表的**現代化的陷阱**，對於當前大陸因爲推動經濟改革所出現在道德上的亂象，提出了相當深刻的批判。她鉅細靡遺的舉出了千百個大大小小的例子，揭露因爲改革所帶來的制度混淆，如何形成各種身居要津的人藉以營私牟利的機緣，從而

註④ 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lection Observation Report* (Washington, D. C.: 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 n.d.).

註⑤ 何清漣，**現代化的陷阱**（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吳敬璉（編），**漸進與激進**（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徐勇，**包產到戶沉浮錄**（珠海：珠海出版社，一九九八年）；顧龍生，**毛澤東經濟思想引論**（太原：山西經濟出版社，一九九二年）。

造成社會分配的極度不公平。她借用了新經濟制度主義中關於財產權的分析，指出產權的不明確因為改革而更加嚴重，形成市場交易的極度扭曲，並提供給相關當事人各種尋租的誘惑。她認為這些層出不窮的、千奇百怪的尋租行為模式，不能逕以改革過程的必然性來理解，因為健康的市場交易有一定的規範存在，不是完全沒有道德的自私自利而已，唯有從事交易的人服膺於這些規範，市場秩序才會起有效分配的作用。如果邁向市場化的改革政策，必須通過這麼一個摧毀道德的過程，那麼改革所寄望的成熟的市場經濟，不可能達得到。

照道理這是一本易讀易懂的書，但其中的意義經旁人解讀起來，竟又可以南轅北轍，於是有的人視她為是新左派，因為新左派也批評自由主義市場經濟中缺乏社會主義道德，也對於因為市場改革所帶來的階級分化，採取嚴厲批評的態度。在何清漣的著作中，她確實借用了古典左派愛用的相對剝奪的觀點<sup>⑥</sup>，但她講的道德所指涉的範疇相當廣泛，其中也有與社會主義道德相銜接之處，但同時又涵蓋了固有文化中一些對腐敗的看法，也涉及以個人為出發點的公平正義原則，故並不能簡單地等同於新左派。事實上，更多的人可能還是將何清漣歸於自由派的陣營，這不但從她的社交圈的性質可以看出道理來，更從這本暢銷著作的深層脈絡中可以體會出來。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她從個體經濟誘因的角度來解釋行為發生的原因。

這裡的張力不難發覺，何清漣作為一位社會經濟分析家時，她對於自己所研究的對象是根據經濟誘因來理解的，但她作為一位知識份子，卻又是處在這個經濟誘因所構成的宇宙本體之外在看世界，除非她承認她自己這麼看待世界的方式，其實是用來吸引讀者買書營利用的。她站在市場之外看世界的時候，同時介紹了社會主義中講平均的公平原則與資本主義中講效率的公平原則，更認可了中國文化中的人格理想。換言之，讓她看大問題的論述依據，與讓她進行分析的論述依據，是分別區隔在集體道德與個體經濟兩不同的宇宙本體之中。這表示，她不是沒有成為新左派的可能，但她絕對也保留了作為自由主義派的認知能力，這種能力就在她處理市場這個概念時表現出來。

對於何清漣來說，市場法則是先驗的存在。雖然她嚴詞批判一般經濟學家將人給客體化成模式與數字，忘記在生活中活生生的血肉之軀，但她自己卻正也是在用經濟誘因理解行為。從方法上說，她的分析絕對的犀利，觀察絕對的敏銳，人文關懷也充斥其中，然而她沒有說明為什麼道德的人會在制度混沌的情境中，受到引誘而變化成為腐敗的人，使得這個變化像是一個自動的、難以阻擋的過程，故她也就只能從制度下手來求解決，於是她的分析方法就把道德降低為一個制度的結果，從而不自覺地弱化了她的對道德的信念，終於就脫離了她的另一個由道德構成的宇宙本體。她可能自己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便如同多數大陸自由派的一樣，借用海耶克與諾斯來補這個新經濟制度主義的道德空白，甚至還上追洛克、孟德斯鳩等人求援<sup>⑦</sup>。這些論述策略使

註⑥ 何清漣，前引書，頁一九一～一九七。

註⑦ 何清漣，前引書，頁三七一～三七五。

人不禁懷疑，她拒絕回到她自己原本熟悉的道德世界來提供解藥（而此一道德世界，正是她批判現狀時的標準所在），乃係一項有意識的選擇。

拒絕的原因恐怕是，那個幫她界定問題的道德世界是與新左派分享的，也是與政治上保守主義相通的，亦即從階級分化或倫理道德的角度進行批判，會使得她作為批判者受到政治利用，成為反改革的工具。何清漣屢次採用人的責任感的概念來說明道德的內涵，無異是將自己與社會主義或固有文化的道德世界加以區隔。但也正因為如此，使得她失去了對市場本身的反省立場，她是在市場已經存在的本體論上要求對改革進行反思的。然而，市場及其相關的市場道德並不是唯一的先驗存在，在她自己對社會主義及固有文化的理解中，就明顯看到這個認識。這並不代表她必須回到集體的道德世界去，但起碼應該幫助她對市場本身的建構採取警戒的態度，即市場並不是先驗的，而是不斷灌輸、實踐、理論化的結果。市場作為一種道德，並不比集體主義更具先驗性。

這個解讀，使現代化的陷阱中隱藏的意義豐富起來，容許我們重新思索社會主義、固有文化與市場道德三者之間的關係。現代中國的一開始，可能曾經先是市場道德與固有文化的對立；四九年以後的中國面臨的，則主要是社會主義與固有文化的對立；到了改革啓動以後，市場道德又與社會主義對立起來；在第三個對立的過程中，固有文化被雙方同時援引，成為新左派與自由主義都不排斥的論述工具。何清漣所沒有意識到，但卻透過現代化的陷阱保留下來的，是不同於海耶克的另一種市場道德的可能性。那個市場是固有道德中的地方基層領導創造的市場，則人們的腐敗不是僅僅來自於制度的誘惑，也來自於社會主義對固有文化的壓抑，以及社會主義道德因為缺乏固有文化基礎而發生的崩解。

一旦接受何清漣的分析，本應能認識到市場與政治領導在實踐上的兩位一體，即在中國，市場是國家幹部衝撞摸索出來的，不是先於國家的宇宙本體。所以，反腐肅貪政策不可能單純地是以建立個人市場責任倫理為目標，以此為目標也不可能成功。在政治立場上看，她迴避社會主義平均主義與保守主義固然合情合理，但若因而賦予市場在本體論上的先驗地位則得不償失。准此，關於政治改革方向的思索，就不能簡化成為在市場所要求的民主政治與社會主義所要求的行政革新之間謀出路，而在於鑿通不同宇宙本體之間的論述脈絡，將道德的人與市場的人放在同樣重要的位置，而不是先承認市場的不可忤逆，再謀求道德上的紓解。儘管何清漣是悲觀的，對行為的分析方法是自由主義的，但她的著作中其實充滿了創意的可能性，有待讀者進一步開展。

#### 四、作為漸進改革的激進改革

九零年代中期同時發行了另一本曝光度遠遠不及現代化的陷阱的學術著作，是由吳敬璉主編的漸進與激進，書中網羅了多位知名的經濟學者，從各方面論政中國經濟改革不適宜採取震盪療法式的激進手段，並對於改革所已經取得的成就，歸因於採行了漸進路線的關係。漸進改革的論述中包括了何清漣所批評的一個觀點，就是將腐敗

看成是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必然現象，使得以行政命令來指導經濟生產的官員們，先透過利益交換獲得好處，把他們從舊的計劃經濟思維中解放出來，從而在觀念上開始願意接受行政命令以外的統治模式。這本書不能像現代化的陷阱那樣暢銷當然與其學術性太高有關，但更重要的恐怕是，這個關於漸進與激進之間的選擇，在實際生活中的意義不大。對讀者而言，這本書的編纂到底有何意義，於是耐人尋味。

不用說，本書的旗幟是反對激進改革的，書中激進改革的代表是蘇聯的震盪療法。有趣的是，在大陸，震盪療法不但不是官方政策中的有效選項，也不曾在學術界獲得足以形成氣候的支持。充其量，人們會分析漸進改革不能一步到位所難免造成的後果，比如形成價格雙軌制或鞭打快牛的管理風格，即使何清漣提出如此震撼的批評，也未曾以激進改革為治癒產權不清的藥方。換言之，本書雖然反對激進改革，但政壇其實並不明確存在於他們所反對的對象，這樣缺乏針對性的書，引不起市場上的興趣實在不令人訝異。但這些經濟學教授出版一本人人事前可以預知不會大賣座的書，到底是包藏了什麼有趣的動機呢？

表面上，這本書是在與發明休克療法的經濟學家薩克斯對話，但中國的薩克斯是誰的問題不得不提出來？這本囊括了所謂自由派與新左派於一爐的書，在面對休克療法的時候，竟取得了統一戰線的作用。事實上，吳敬璉本人對於漸進與激進這種二分的視野，保持著相當不以為然的態度<sup>⑧</sup>。在幾乎所有作者都推崇漸進改革的同時，他作為編者卻批評漸進改革的概念有問題。他非常清楚地意識到，他自己過去許多經濟政策上的發言，都曾被質疑是在走激進的路線，而其他一些看似激進口號喊得震天價響的人，反而正是利用改革不完全來圖利的人，他們是阻擋改革進程的既得利益者。吳敬璉要揭穿那些支持承包制的假激進改革者，他們讓言論市場變得混亂不堪，因為他們既非激進主義者，又非改革者。

這最後一點的批判，把吳敬璉與何清漣之間的距離縮到了零。但這樣一來，編者吳敬璉的反漸進主義與作者群的反激進主義怎麼調和呢？必須看到，吳敬璉絕對不是薩克斯，所以漸進主義者反對的激進主義，當然不是針對吳敬璉而發的。而吳敬璉反對的漸進主義，則是偷雞摸狗的假的漸進主義，也當然不是他作者群當中的多數人。簡言之，這本書是在辯論什麼才是漸進主義，而不是激進主義與漸進主義孰優孰劣的問題。如果薩克斯才是真正的激進主義者，無論如何就不能用激進主義的帽子來戴吳敬璉的頭了。一旦吳敬璉不能被歸類為激進主義的時候，則吳敬璉顯然支持的「把改革推向國有部門」、「整體推進，重點突破」，和「督促加快」、「一鼓作氣」、「闖關」就不能任意指責是在搞激進主義了<sup>⑨</sup>。中國之內倘若沒有激進主義者，則反對激進主義就不能成為反對改革的理由。

這樣一來，誰是中國改革中相對而言的激進主義者已經呼之欲出，那就是吳敬璉自己與他的作者群中的若干人。現在，他們把問題轉移給了休克療法，希望大幅度的

註⑧ 吳敬璉，「中國採取了『漸進改革』戰略嗎？」，漸進與激進，頁一。

註⑨ 吳敬璉，前引書，頁六～九。

擴張了漸進主義的範圍，使他們對改革的建議能擺脫無聊地對他們搞激進主義的指控。這算不算一種陰謀呢？不算。對吳敬璉而言，那些假的激進改革者或許才是陰謀家，更重要的，是反改革的保守派更是在用反激進主義的曖昧口號意圖阻撓改革。在此，何清漣鍾情的新經濟制度主義分析受到了質疑，因為制度主義者強調的就是漸進改革，而一位書中作者卻大張旗鼓地為新古典自由主義辯護<sup>⑩</sup>，認為制度主義者錯把漸進與激進的分野，用改革的成本來衡量，以為凡成本過高就是激進，忽略了把改革的效益同時考慮，只有新古典自由主義才會注意到高成本與特高效益可能共生的現象，也就不會掉到所謂激進與漸進的簡化對比中。

漸進與激進把漸進的內涵變成了一個可以辯論的觀點，而不只是在一個在既有的標準上測量改革速度的問題，這個方法當然可以適用到政治改革的領域中去。在中共政治體系中，很少人會反對政治改革應當也是漸進的。不過，假如什麼是漸進的改革本身成為話題的話，就使改革政策的方向與範疇不能有什麼客觀的標準。這種把漸進主義在論述上加以問題化的手段，阻擋了有人用激進主義的標籤來反對改革。原本發動激進與漸進的辯論意義在於，有人太激進了，所以只要任何人對改革的某一點提出異議，就可以指責對手是激進主義。吳敬璉發明的應對方式極具創意，他把激進界定在遙遠的外國，把漸進的客觀意義推翻。這個論述方式，將來勢必在政治改革的討論中也會出現。

## 五、包產到戶之前的包產到戶

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在歷史真空中發生，尤其是對於像包產到戶的這樣的變動，當然也有歷史軌跡可尋。徐勇所著包產到戶沉浮錄就記載了「包」字所蘊藏的豐富的歷史傷痕，說明了「包」的意義是如何在各種政策的管制中，在各個地方以多種多樣的創意形態，餘燼未滅的苟延殘喘，等到一九七九年之後一呼四應地爆發成波瀾壯闊的農村生產力大解放。徐勇的書是一九九八年發表的，在付梓之前兩年，適巧有旅美華裔學者楊大力的博士論文發行出書，無形中似乎是在為徐勇的書催生。根據楊大力的研究，愈是在一九五八年公社運動與三年大飢荒中傷亡慘重的地區，如安徽，在七八年以後接受包產到戶的速度愈快，儼然是在對過去二十年發展策略的抗拒，說明了改革的動力受到歷史上壓制與迫害經驗的影響，呈現出反動的趨勢。

徐勇從制度發展的歷史較好的提出補充，即這一股反動並不是二十年真空後的再造，而是靠在這二十年間的創意調適，不絕如縷地維護了承包的火苗。五八年推行公社運動以來，各種顛覆性的因應手段紛紛出籠，「田間管理包到戶」、「定產到丘」、「社隊分權」、「以產定工」、「姊妹田、夫妻田」，結果批判承包制的文章不斷，但試想，沒有存在承包制的话，為什麼要批判呢？批判從兩方面維繫了承包作為觀念上的一種可能性。首先，批判承包制的官方立場，假定了承包制所指涉的範疇

註⑩ 李曉西，「漸進與激進的結合：經濟為主導的中國改革的道路」，頁四四～五七。



是眾所週知，因而鞏固了承包制作為一種制度的典型。其次，大批判等於向農民暗示，還有不少農村仍在負隅頑抗，所以產生了適得其反的宣傳效果，因此反而增加了觀風向的投機心理。

果然俟大飢荒一降臨，六零年代初期就有各種包工包產復甦，其中帶頭的就出現在第一個開始搞公社的河北省，後來又提出「三自一包」，鄧小平更開放責任田，成為後來文革中被批鬥搞「單幹風」的重要材料。在這中間，最敢嘗試的公社領導一向出現在安徽省。文革開始後各地仍有不顧一切搞「小包工」的，甚或斗膽向毛上萬言書推薦「借田借地」；或無法推動的時候，就向遭到批鬥的農民領袖偷偷送菜送飯。這些遭到被批鬥的農民領袖，面臨對承包著詆毀，毫無意識到，這竟然是在那種政治環境裡對承包制最有效的一種宣揚，以致關於「包」的論述不斷出現在公共領域之中，尤其是之後文革一旦被否定，承包制在無形中便成為一種撥亂反正的象徵，而保留「包」文化最頑強的安徽，就成為最早的突破口。簡言之，徐勇發掘了「包」字的偷生之道<sup>①</sup>，看到了政治經濟改革方案在發生之前，即已經有其生命的存在。

就像包產到戶一樣，任何政治制度的改革方案或作風，不能超越人們的認知範疇無中生有。就連今天自由派的作家所運用的邏輯，也一樣在某種程度上是承接了五四以降的自由主義精神。雖然在性質與意義上，一個能從寂靜中復活的知識傳統，必須依時空的轉換而開展，但傳承是不可避免的，這不僅是指知識內容會有若干銜接之處，同時也是因應論述策略上的起承轉合需要所致，或是託古改制，或是文藝復興，或是繼承道統。即使極端如高行健之**沒有主義**的虛無飄渺<sup>②</sup>，都若即若離地攀附在「道可道，非常道」的哲學立場中。綿延不絕的承襲手法往往是隱諱的，甚至不自覺的，不足為外人所道，等到有一天星火燎原之時，人們才意識過來，過去團結一致的高亢言論，是多麼地受到當時時代的侷限。好比台灣總統大選選出了強力支持分離主義的元首，選後的社會卻出現難以遏止的大陸熱。

除了長期裡的星火傳承自有邏輯外，在政治最黑暗的短期之中，英雄人物也不可或缺。故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民運潰散之後所經歷的三年整頓，並不是如外界所以為的死水一片。經常全國發行的學術刊物，在刊首高舉要讓社會主義蔚然成風的大旗後<sup>③</sup>，緊接著便開始辯論，人權是集體或個體的？法律是義務導向或權利導向的？而天安門民運本身的串聯，更不能脫離文化大革命期間各高校之間的串聯來理解。換言之，人們今天看待政治改革的議題時，不宜只看特定改革主張有沒有檯面上的支持者，如果沒有，就宣告改革機運渺茫。相反的，觀察的角度應當是，有什麼樣不同路數的政治改革機緣，以什麼樣的創意形態，隱藏在什麼樣的脈絡之中？分析家本人不能被某一種特定的（尤其是基督教世界的）改革主張綁住，才能體會大陸社會的生機澎湃。

註① 徐勇，前引書，頁二〇九～二一三。

註② 參見高行健，**沒有主義**（香港：天地出版社，二〇〇〇年）。

註③ 王忍之，「讓社會主義思想道德蔚然成風」，**求是雜誌**，第二十三期（一九九〇年），頁七。

## 六、不為統一戰線服務的調查

改革的可能性既然不能憑空臆測，也不能任意輸入，則思考改革問題最好的方法，是否可以用毛澤東親身實踐出來的「調查」方法呢？在顧龍生寫的毛澤東經濟思想引論一書中，調查方法被突出為毛最根本的政治經濟方法。不能否認這本在一九九二年出版，但可能早幾年前便已經脫稿的作品，有濃厚地要替改革開放託古改制的意味，因此將毛的經濟思想儘量往有利於改革的方向詮釋。雖然不無牽強，但若最後落實到調查方法的話，的確與鄧小平提出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頗有異曲同工之妙。然而，如果就說改革的方向要奠定在調查上，又很難服人心，畢竟是毛澤東自己曾經發動人民公社運動與文化大革命，成為黨在歷史決議中檢討的對象，莫非是毛本人沒有能堅守調查方法嗎？

在顧龍生的字裡行間有一些蛛絲馬跡。毛所謂的調查，並不只是調查而已，還必須運用到辯證法，因此正確的調查是有針對性的，也就是要找出主要矛盾之所在，主要矛盾之所在決定了當前階段中，建立統一戰線時的敵友關係如何界定。不過，在檢視毛對鄧子恢的鬥爭時，顧龍生不指明地透露了毛是如何偏離調查方法的。早在一九五六年，鄧子恢就明白質疑過快的推動農業合作化，他是經過調查提出的保留意見，就像徐勇筆下的農民領袖那樣，是根據實際調查經驗在向毛上萬言書。可以說，毛其實是事先決定了主要矛盾之所在以後，才發動調查的。調查的目的，是蒐集站在對立面的勢力違反了什麼科學的階級法則，將他們突出地擺在眼前，發動統一戰線。

毛這種倒因為果的做法是有意識的，在他寫給陳伯達的一封信中，就曾講述過一個「執兩用中」的道理<sup>⑭</sup>。毛認為，過去人們主張的是中庸，即先有兩邊，我們選擇站中間，但這是錯的，應該是先有中間，再反對過與不及。不過，顧龍生不但沒有打算批判毛，還努力用毛在調查方法方面留下的許多見解，在為改革開放的道理撐腰。顧龍生為了保護調查方法而保護毛，在談到三年大飢荒時毛指示要調查的時候，顧龍生用的是贊許的眼光，然而毛的調查到底是要為經濟發展服務，還是為政治鬥爭做準備，應該不難分清楚。毛在一九六三年發動農民教育，不就說明了他不打算根據調查的結果來定政策，而是要用調查所得來決定誰是必須改造的農民領袖。

顧龍生特別引述毛在一九六一年的一段話，說「不要怕聽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見，更不要怕實際檢驗推翻了已經作出的判斷和決定」<sup>⑮</sup>。他不再講下文，因為毛要推翻承包制是很明顯的，所以所謂調查反而是動員農村的疋子，重新建立一個反承包制，反退社的統一戰線，後來演變成反對劉鄧集團派出工作組的政治鬥爭，成為文革的前奏。由於這段歷史並不是學術界的祕密，顧龍生的手法就難免引起讀者不安，認為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未必有必要如此保護毛，而可以直接指明毛才是脫離調查方法

註⑭ 侯憲林，「毛澤東對中庸思想的批判與繼承」，齊魯學刊，第三期（一九八七年），頁四九。

註⑮ 中共中央關於認真進行調查工作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的一封信，引於頁二八～二九。

的始作俑者。然而，顧龍生的顧忌不是全無道理的，他要保護毛的心態，和何清漣要採用新經濟制度主義的分析來談道德的道理一樣，就是不願意為政治上的保守勢力所利用。假如顧龍生批判了毛，人們便可以問，大權在握的鄧小平不也會偏離調查方法嗎？事實上，鄧後來疾呼「改革是硬道理，不改革就下台」，就很像毛在發動公社運動以後對調查方法的御用態度。

這樣的反省有歷史實踐作為見證，在一九八九年發生對天安門民運的鎮壓後，中共黨中央深切檢討，發佈了關於黨同人民關係的重要文件，重提群眾路線的重要性<sup>⑩</sup>，等於再一次援引調查方法作為治療方案，警惕黨要與人民站在同一戰線上，將民主集中原則中的民主與集中提到同樣高度，則自然必須深入調查民間的想法。於是，在一片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政治聲浪中，因而清晰地聽到「精神文明也要因地制宜」的開創性主張<sup>⑪</sup>，前述關於個體人權的探討結果仍發行全國，沿海的經濟改革默默地進行不輟，村民自治組織的建立也未曾終止。俟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之後，赫然釀成所謂的**第二波思想改造**。

調查與改革是不可分離的，任何對政治改革的建議，必須是根據某種形式的調查才提的出來。然而，調查可以是支持改革的，也可以是反改革的，端視被調查的對象的性質與時間點而定。被調查對象的性質決定了是反對改革的人在發聲，還是支持改革的在發聲；時間點同樣重要，改革發動前的調查是要凸顯不改革時的**問題**，改革發動後的調查是凸顯改革帶來的**問題**，改革完成後的調查則是要凸顯**成績**的。現代化的**陷阱**屬於第一類，旨在推動改革的深化，但出版前遭遇困難，因為發行單位曾經擔心會被利用成第二類的調查。**漸進與激進**屬與第二類，是對激進改革的批評。**包產到戶**沉浮錄屬第三類，是在為農村公社的壽終正寢蓋棺論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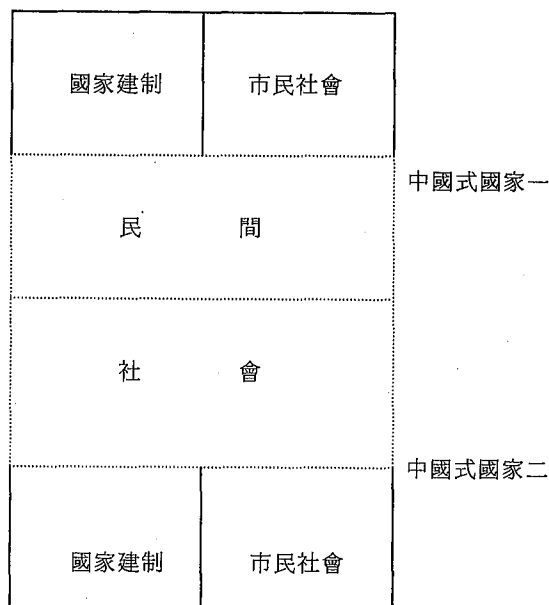
## 七、去目的論的改革研究

由於對中共政治改革的研究集中在行政革新與民主化兩方面，前者以大陸學者為主，後者則以海外學者為主，因此改革所代表的意義便被凝固住。依照這兩方面的研究設計來看，改革作為一個過程，無形中就染上了某種目的論的傾向，要麼以中共中央更有效的領導統治為目的，要麼以弱化共黨統治的兩黨或多黨制為目的。相較之下還有另一種理解改革的方式，那是反目的論的，其研究宗旨不在說明改革不得行的歷史方向，而是在找尋無窮的創新可能。目前對政治改革的研究欠缺最後這一方面的探索，也就是將改革當成一個把既有路徑開放的機制，故雖然不否認任何時間點上都存在某種外在結構的制約，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建立一種論述機制，使得正在受到制約的歷史進程中，仍然保留出現變遷的可能性，從而容忍未來出現意義迥異的新路徑（或舊路徑）。簡言之，改革研究的新重心之一，是歸納並蒐尋政治發展的各種其他潛在可能。

註⑩ 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同人民群眾聯繫的決定（上海：新中國出版社，一九九〇年）。

註⑪ 「上下不強求一致，左右也不要求看齊」，見聯合報（民國八十年一月十三日）之大陸新聞報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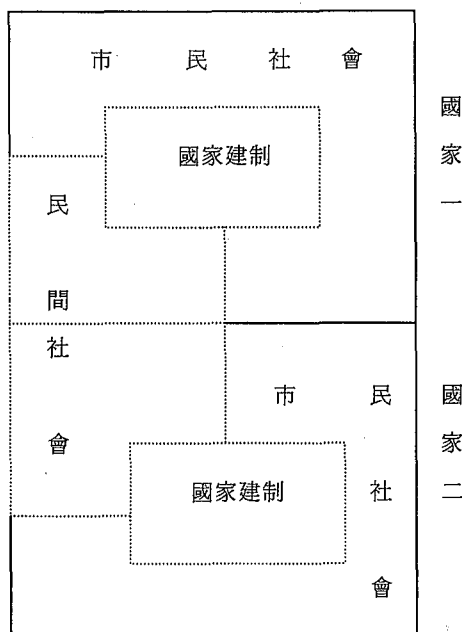
圖一 中國式國家與社會



這種以開創可能性為出發點的研究，能不能與以消滅可能性的研究彼此對話呢？這個問題缺乏有效的知識論角度來回答，因為強調必然性與普世性的科學知識論，與重視偶然性與情境性的人文知識論，向來很少有對話。以下的討論就很難在人們所熟悉的語言範圍中開展，這時一個勉強可試的解決方案，便是透過圖示。在下圖之中，將世界上的國家主權分成兩個，上方是中國主權，下方是其他東方的國家主權，國家主權分成兩個部份，一個是國家建制，另一個是社會，而社會又分為市民社會與民間社會。

市民社會與國家建制之間的分野很清楚，具有法律的基礎，市民的權利與義務皆有明訂，並經由市民之參與而決定。國家建制則代表規範市民之間權利義務關係的機構、規則、習慣、過程。民間社會則是指生活在法律規範以外的人際關係，受到文化、歷史、情感、人格的影響，民間社會與市民社會之間的分野是模糊的，與國家建制之間的關係也是模糊的，所以它們之間的區隔用虛線表示。產權制度與現代市場的引入中國，使得市民社會與國家建制之間出現益加鞏固的界線。一般政治經濟改革討論到國家穿透社會時，都主要是指以國家名義侵入市民社會，從而破壞了市民社會的自主性，而所謂市民社會對國家的穿透，則不在上面的圖示中，那是屬於西方國家建制的模式（見圖二）。在中國，市民社會是用來抗拒國家用的，而不像西方，是國家座落之所在。故圖二中，國家建制的界線是虛的。同時，民間社會的力量相對較小；市民社會與國家建制的規範共通性頗高；民間社會的力量則以基督教為核心。

圖二 西方國家與社會



在圖一的中國，如果看到百姓以市民（或公民）權利之名去對政府興訟，投票反對某個候選人，在街頭陳情、遊行抗爭，都不是對國家建制的穿透，而是在伸張民間社會的人的不平之鳴，它們之所以進入市民社會，是因為受到國家建制對民間社會的入侵，希望轉而經由市民社會中公民享有的權利身份，停止國家建制對民間社會的汲取<sup>⑧</sup>。但假如相反的情形發生，亦即是民間社會腐化了國家建制，則大量市民社會中享有身份的人，會透過體制外的機制進入民間社會，再入侵國家建制。國家建制和民間社會之間的相互入侵，容許人們去觀察市民社會的法律機制是否強到足以抗拒國家。至於特定時間點上是誰入侵了誰，不是這個圖要說明的，這個圖是要保留影響力行使方向的各種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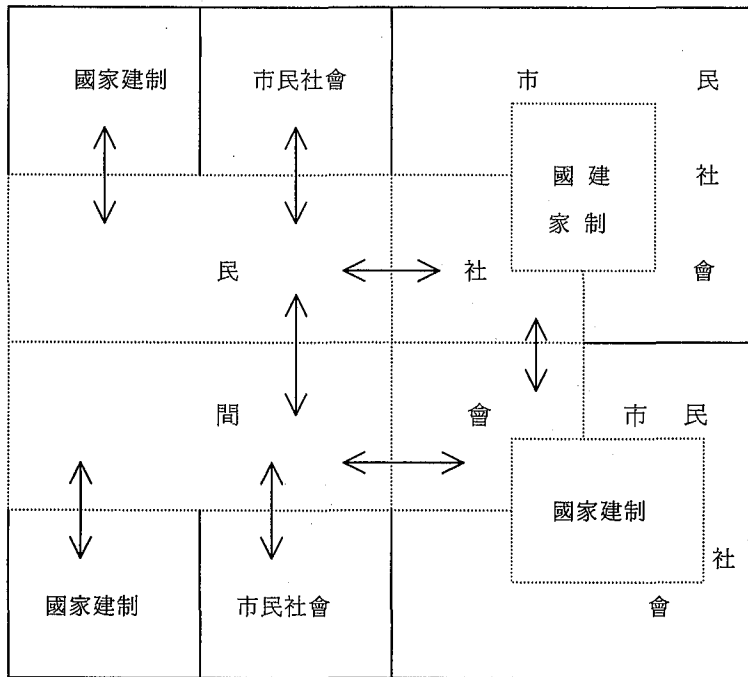
如果將上述兩個圖結合在一起的話，就使得政治改革的可能方向更豐富。從傳統的國家建制與社會沒有分野開始，先是輸入了西方市民社會的觀念與制度，這時有可能出現好幾種方向的變化：（一）市民社會會發展成為圖一抗拒型的產權制度，只有在國家建制入侵民間社會時才會起作用；（二）市民社會發展不起來，則國家建制和民間社會就回到傳統區隔模糊的狀態中；（三）對市民社會的觀念和制度內化因此進入右半邊原本圖二的部份，這時的國家建制成為民主化下受到穿透的場域。但不論進入上述哪一個模式，民間社會的邊界始終是模糊的，因而就保留了當下所正經歷的發展方向，仍有出現轉變的可能性。同理，當政治改革的意義被理解為行政革新時，並不代表民

註<sup>⑧</sup> Kevin O'Brien, "Rightful Resistance," *World Politics*, vol. 49, no. 1 (October 1996); Kevin O'Brien and Lianjiang Li, "The Politics of Lodging Complaints in Rural China," *China Quarterly*, vol. 143 (July 1995).

間社會就一定處於被宰制的位置，因為民間社會也繼續保留了穿透國家的可能，也甚至有可能接受市民社會觀念，使行政革新與民主化並進，這些路徑在圖三中都可以找到。

圖三當然不能窮盡所有可能性，充其量只是一個例子說明新的圖示論述機制的重要性與其作用，那是一種能容忍既定目的出現變化的分析符號，使得被打開的傳統政治模式，除了往某些研究者所界定的方向，比如民主化的改革外，同時保留了其他研究者所界定的行政革新的改革方向、或兩個方向並存、或新方向與舊模式並存、或回到舊模式等多種可能性。這些可能性的保留，使政治改革研究更接近於作為一種研究，而遠離作為一種充滿目的論的政治主張。

圖三 政治改革的可能方向



(箭頭為影響方向)

## 八、保留開創可能的政治改革

現代化的陷阱將隱藏的政府與市場之間不能區分的關係揭露了；漸進與激進重新將漸進的範疇大幅度的擴大；包產到戶沉浮錄則把政治上埋沒的可能性如何死灰復燃的過程重現。這三本書挑戰了任何試圖永久阻撓改革的可能性，也顛覆了任何獨尊一術要為改革定方向的野心。毛澤東經濟思想引論對調查方法的強調提醒我們，文本中任何隱藏的可能性，都是調查方法可能引用的依據，想要讓這些可能性成為政治上的實際，自然有賴於調查工作的揭露。於是文本就是改革可能性被保留之所在，同時當

然也蘊含了扼殺改革生機的論述；而調查方法本身將不斷地受到政治妥協的影響，遊走在不同可能性之間。

應該說，中國大陸的政治改革不是短期現象，不是線性發展，更不能切斷時間點來觀察。發覺潛在改革方向的可能性範圍，比決定某個特定方向的改革會不會發生，可能更有意義。因為往特定改革方向的發展，固然可能成真，卻不能決定什麼時候這個方向會發生變化。不論是何清漣或吳敬璉，他們書中犀利的分析與批判卻散發相反的訊息，那就是未來發展的方向是高度不確定的。這種不確定性恰恰是徐勇沒有意識到的重大發現，亦即改革的意義與進程都是載沉載浮的，包產到戶的不死，是一種對人類創意能力的認可，但也是對於特定歷史發展方向的否定。至於未來中國政治繼續發生改革的可能性，就應該用最開放的視野來調查，而開放視野的建構，則必須仰賴對文本不斷地解讀。

但是一般所討論到的政治改革，無論指的是行政革新或民主化，大體要由某種制度的改革著手，制度化的意義在於將原本體制外的發展納入體制內，其結果反而勢必產生對社會紛雜現象的一種凝固作用，並不能容許發展中的社會多元進程，不斷開拓更寬容的論述空間，則制度或意識形態導向的政治改革所創造的，不過是另一種具有規範性的制約力量，使國家體制得以繼續用管理的身份，向民間輸出意識形態。固然，沒有哪一種國家體制的極權力量，即使它可以達到完全消音的地步，也不能真正將社會脈絡徹底壟斷，或將社會生機窒息，逆向反動的力量就依附在國家的壓制之中，就算事後看起來苟延殘喘，但卻其實澎湃洶湧，只是沒有適當的機制加以釋放，或適當的論述予以詮釋罷了。研究政治改革文本的目的，不是要指導改革的方向，而是要說明逆向能動性的無所不在與無可壟斷，將對政治改革的探討，超越制度規範與社會勢力的層次，回歸到最原初的混沌中，從而開放更多的可能性。

\*

\*

\*



## Review Essay: Opening the Texts of 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

He Qinglian: The Trap of Modernization

Wu Jinglian, et al., Incrementalism and Radicalism

Xu Yong, The Change and Continuity of the Household Contracting System

Gu Longsheng,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 Economic Thought

*Chih-yu Shih*

### Abstract

In this paper, I re-present the following four texts for the purpose of revealing the unlimited possibilities of 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 These texts include The Trap of Modernization, Between Incremental Reform and Shock Therapy, The Fall and Rise of the Family Contracting System, and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 Economic Thought. These texts suggest how possibilities not considered likely before were preserved in the past and have re-emerging at a later date. They also contain an undecidable direction of reform in the future that is inconceivable today.

**Keywords:** modernization; reform; political reform discursive analysis;  
textual analysis

